

# 中國

ZhongGuo

WenHuaTongShi

## 文化通史

先秦卷



总主编 郑师渠 分册主编 王冠英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与创造。中国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同时也蕴含着她的情感、智慧和民族精神，数千年来，历风雨而不衰，遭浩劫而弥坚，为中华民族的生息不已提供了不竭的生命源泉，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國

ZhongGuo

WenHuaTongShi

## 文化通史

先秦卷

总主编 郑师渠  
分册主编 王冠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通史·先秦卷/郑师渠总主编;王冠英分册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  
ISBN 978-7-303-09862-0

I. 中… II. ①郑…②王… III. 文化史—中国—先秦时代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379 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 mm × 250 mm  
印 张:30.25  
字 数:480 千字  
印 数:1~3 000 册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0.00 元

---

策划编辑:饶 涛 李雪洁 责任编辑:饶 涛  
美术编辑:高 霞 装帧设计:高 霞  
责任校对:李 茵 责任印制: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 【中国文化通史】

## 编委会名单

---

名誉总主编

龚书铎

总主编

郑师渠

副总主编

叶佐英 王冠英 曹文柱 史革新 黄兴涛

编委

龚书铎 郑师渠 叶佐英 王冠英 许殿才  
曹文柱 王永平 吴怀祺 郑强胜 任崇岳  
陈梧桐 赵云田 史革新 黄兴涛 孔德龙

策划

孔德龙 王 杰

---

# 【中国文化通史】

## 主要撰稿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

丁 青	王立军	王记录	王灵善	王冠英
王振芳	王 晖	仇正伟	左玉河	史革新
匡雁鹏	朱耀庭	任崇岳	向燕南	全根先
刘素琴	许殿才	孙景峰	苏全有	李少兵
杨汉卿	吴怀祺	陈红宇	陈名杰	陈梧桐
陈朝云	佟 洵	佟 辉	汪学群	宋卫忠
张英聘	张建伟	武才娃	林永匡	周兆望
郑师渠	郑强胜	赵云田	赵凤玲	赵冰波
赵 朝	胡志华	段 续	侯 明	俞祖华
施光明	洪书云	贾洲杰	陶 绪	黄兴涛
曹文柱	曹兴信	焦润明	雒启坤	

---

# 总 序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欲理解中国文化，舍其历史无由。而欲理解中国文化史，界定文化的概念，梳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特质及其研究状况，又是十分必要的。爰作是序。

##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问题是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的概念，迄无统一的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各国学者讨论什么是“文化”，也未取得共识。据统计，有关文化的概念，多达数百种，人们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从西方的历史上看，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代。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古老的文化概念，是由约两千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来的，它从拉丁文译成英文是“culture is the philosophy-or cultivation-of the mind”。汉译为“文化是心灵的哲学（修养）”。其中 cultivation 本义是耕种，引申意为耕种—栽培—培养—修养。这可谓

哲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并视文化是一个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目标的动态的创造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中世纪。有代表性的是艺术的文化概念：“文化是艺术的总称。”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提出来的，强调文化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和自由的创造。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其间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一是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提出的：

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是为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的所有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sup>①</sup>

这是心理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们借助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文学艺术中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陶冶心灵，追求社会完美与和谐的过程；二是另一个英国著名学者泰勒1871年在《文化的起源》中提出的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他说：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sup>②</sup>

泰勒的定义第一次强调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和“文化是整个的生活方式”。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20世纪初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学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个多义词，我们这里是在包容较广的社会学含义上使用它，即它是指人造物品、货物、技术过程、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它们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遗产。这文化包括所有习得的行为、智力知识、社会组织 and 语言、经济的、道德的或精神的价值系统。一种特定文化的基础是它的法律、

<sup>①</sup> 转引自[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60～1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sup>②</sup> 转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99～10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sup>①</sup>

此一定义第一次强调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是文化内涵的核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视野的拓展，人们进而在生物学乃至在整个宇宙的范围之内，探讨文化问题。例如，生物学的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不同物种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项目”主持人、加拿大学者谢弗，则进而提出了宇宙学的文化概念：“文化一般是指物种，特殊地是指人类观察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务，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sup>②</sup>

由上可知，西方文化概念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拓展与深化的。据统计，1920年前只有数种不同的文化定义；但是到1956年，就已多达150余种，也集中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如果说阿诺德的定义是对古代以来文化认识的集大成的话；那么泰勒的定义强调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和“整个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学家强调文化内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则更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构成了今人理解文化的现代基础。这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至于其后新说迭起，尤其是生物学的、生态学的、宇宙学的概念的出现，固然反映了人们视野的开拓，但是文化的概念既囊括了物种与宇宙，实渐泛化了，以至于无从把握。

从中国历史上看，“文明”一词的出现要早于“文化”。《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文化”一词虽然也是古已有之，但它被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和概念加以使用，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在秦汉时期，儒生编辑的《易·贲卦》的《象》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文化”尚未构成一个完整的词。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将“文”与“化”联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不过，这里的“文化”仍非一个完整的词，而各有独立的意义，“文”指文德，“化”指教化，即借文德行教化。其后，晋人的诗文中出现了完整的“文化”一词。如束皙的《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则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至此，“文化”显然已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

<sup>①</sup> 转引自冈家胤：《西方文化概念面面观》，《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上述参考了该文的内容。

<sup>②</sup> 同上。



和概念，开始为人们所广泛使用。其含义包括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这与西方古代哲人强调“文化”的内涵在于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的目标，是相通的。

语汇是随着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变动而变动的。在西方，文化的概念所以于近代以后发生了日益深刻的变动，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科学的进步以及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分不开的。反观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余年，沉沉一线，“天不变，道亦不变”。与此相应，已有的“文化”一词，古色古香，其内涵也无甚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因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解体，且日益走向世界，语汇便渐生变动。在一些新的语汇出现的同时，更多的语汇增加了新的内涵。就“文化”一词来说，其新义的增加尤其是人们自觉重新探究其内涵，界定其概念，则要晚到20世纪初。梁启超诸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sup>①</sup>梁漱溟则谓：“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sup>②</sup>胡适也指出：“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sup>③</sup>他们都强调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复杂的整体（“共业”）和“生活的方式”，这显然是接受了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

所以，尽管国际上对文化迄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界定，但泰勒的定义实已构成了人们进一步探讨文化问题的现代基础。同时，在此基础上，除主张文化泛化者外，人们也毕竟形成了相对的共识，即认为文化可分作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来理解。梁启超曾说：“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sup>④</sup>就已经有了此种见解。今天我们可以作进一步表述：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东西构成了文化。具体讲，它包括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文化是文化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狭义的文化就是指精神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意识、情感、意志、价值、信仰、知识、能力等等人的主观世界的活动及其物化的形态或外烁的成果，如典籍、语言、文字、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风习，等等。

对于“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人们也颇存异议，但从总体上看，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学术界一般将“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进入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即是与“文化”并无直接瓜葛的学术上的专有名词；二是“文化”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③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

与“文明”同义。美国学者亨廷顿说：“当谈论文明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种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存在。”<sup>①</sup>他显然是将“文化”与“文明”视作同义词，等量齐观。故所谓“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人们通常也称作“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是“文化”与“文明”都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称，但前者是动态的，后者则是静态的。陈安仁说：“文明是指静的状态而说，文化是指动的状态而说。”<sup>②</sup>张崧年也曾指出：“文化是活动，文明是结果，也不过一事的两看法。”<sup>③</sup>

本书对文化的界定，取狭义文化。对“文明”一词的使用，则据行文的需要，兼顾三义。

## 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回顾

文化史是古老的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真正的确立，在欧洲要晚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文化史之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实为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后，西方关于文化史的著述日多，渐渐蔚为大观。

在中国，文化史学科的确立更要晚到20世纪20—30年代。梁启超于此有创榛辟莽之功，他曾拟撰多卷本《中国文化史》，遗憾的是仅成《社会组织篇》计8章，壮志未酬。但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有关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已是联翩出现。1924年《史地学报》有文报道学界消息说：“近来研究历史者，日新月异，内容大加刷新，多趋重文化史方面。”<sup>④</sup>足见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和编纂，是时已开始浸成风气。其中较重要的通史性著作有：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缪凤林的《中国民族之文化史》、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王治心的《中国文化史类编》、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等。此外，涉及断代的、区域的和专题性的有关文化史著作也相继出版。其中，专题性的著作，尤以王云五主

<sup>①</sup> [美]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0期。

<sup>②</sup>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据文通书局1942年版影印，6页，上海，上海书店，1992。

<sup>③</sup> 张崧年：《文明与文化》，《东方杂志》第24卷第24号。

<sup>④</sup> 《史地界消息·历史类（一）〈研求国史方法之倡导〉》，《史地学报》第3卷第1、第2合期，1924。

编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为代表。丛书仿效1920年法国出版的《人类演进史丛书》及1925年英国剑桥大学主编的《文化史丛书》的体例，共分80个专题，每册一专题，于1937年后相继推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该丛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于20世纪20年代后蔚为风气，并非偶然，至少可以指出以下的原因：

其一，是近代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深化的必然结果。经五四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不仅日益激烈，且愈趋深化。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省西方文化的思潮。与此相应，国人相信西方文化必有所短，中国文化自有所长，因而要求重新审视固有文化。为此，探讨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史自然便成了当务之急。张荫麟说：“文化是一发展的历程。它的个性表现在它的全部‘发生史’里。所以比较两个文化，应当就是比较两个文化的发生史。”<sup>①</sup>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绪论》则强调该书的旨趣，即在于回答：“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而钱穆在《中国文化导论·弁言》中，说得更加明确：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搭配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sup>②</sup>

很显然，这就是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必须重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其二，借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谋国家复兴。20世纪30—40年代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民族危亡唤醒全民抗战和谋国家复兴的慷慨悲壮的时代。愈来愈多的国人意识到了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康敬轩在《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跋》中说：“念一年秋，予归自欧洲，默察大势，知欲救国家危亡，必先求民族之复兴，而求民族之复兴，必先求文化复兴。”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自序》也说，近世治国家学说者，皆谓土地、人民、主权是国家三要素，必得三者安全独立，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实则，即便三者尽得，“而文化不能独立，亦遂足以当国家之名实乎”？帝国主义侵略弱国，不仅占有其土地、人民与主权，“尤且汲汲

<sup>①</sup> 《论中西文化的差异》，参见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

<sup>②</sup>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弁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皇皇，以消灭弱小国家民族之文化，吁！可怖哉”。<sup>①</sup>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化史著述虽出自日人之手，它们对于国人著述不乏借鉴的作用，但如1903年出版的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和1926年出版的高桑驹吉的《中国文化史》，其有意歪曲历史和贬损中国文化，也是人所共见的。因此，编纂中国文化史，给国人以正确的民族文化教育，以振奋民族精神，史家责无旁贷。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叙例》因之强调说：

中国文化之评价各有不同，有谓为落后者，有谓为优美者，然不论其评价如何，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晚近中国国势不振，即由于文化教育之失败所至。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sup>②</sup>

其三，新史学思潮影响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重要时期。传统史学重政治史，而新史学思潮则要求扩大史学范围，注意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指出，“从兰克时代到阿克顿时代，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这一点极少怀疑”，而经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冲击，“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sup>③</sup>西方史学思潮的此种变动，也强烈地影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日益传播，与此同时，作为欧洲相对主义史学衍生物的美国“新史学”，也传入了中国。新史学派主要人物的代表作，如鲁滨逊的《新史学》、巴恩斯的《史学史》、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等，于20世纪20年代也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派同样主张扩大史学范围，加强对于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何炳松在《新史学导言》中说：“旧日历史家，又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sup>④</sup>由于新史学派的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当时的

①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自序》。

② 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叙例》，南京，正中书局，1942。

③ [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3、1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④ 何炳松：《何炳松论文集》，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虽在 20 世纪初即有研究文化史的初步主张，但仅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20 世纪 20 年代后，因受新史学思潮的广泛影响，中国史学家要求扩大治史范围，注重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实已成为时尚。所以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指出：

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实则民族社会之史料，触处皆是，徒以浩穰无纪，读者不能博观而约取，遂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鉴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教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举无可稽。吾书欲去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惟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sup>①</sup>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同样强调说：

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顾吾国所谓历史，不外记历朝之治乱兴亡，而于文化进退之际，概不注意，致外人动讥吾为无史。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斯言虽或过当，然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未始非缺憾也。<sup>②</sup>

此期的文化史研究不仅出版了一批成果，而且对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探索，提出了某些有益的见解：

(1) 分类与综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文化史当分类研究。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一章，其中说：“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学等等，“我们可一件一件的讲下去”。<sup>③</sup>王云五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中也提出，以综合方法编纂文化史，“其难益甚”，宜“就文化之全范围”，区分若干科目，作系统详尽叙述。如此，“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sup>④</sup>王治心的书即取名为《中国文化史类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7 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②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自序》，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

③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134 页。

④ 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编》，内分经济、风俗、学术思想、宗教伦理和艺术器物五类。作者在“绪论”中说：“这五个大纲，或者可以把整个的文化大约地包括起来。……合起来可以成全部的文化史，分开来也可以成为各自独立的五种小史。”<sup>①</sup>但是，柳诒徵诸人不赞成分类而主综合的研究方法。柳诒徵以为，分类的方法难以说明文化发展中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表现“民族全体之精神”，“此纵断之病也”。<sup>②</sup>何炳松则指出，分类纵断的研究无法表现“某一时代中整个的文化状况”，由此组合成的所谓文化史，“不是整个的；是死的，不是活的”。<sup>③</sup>应当说，柳诒徵等人主综合的研究方法是对的，因为文化专史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文化史不应是各种专门史的简单组合。

(2) 文化史的分期。此期的研究者都将进化的观点引入了文化史，强调要“注意动的研究方法，从历史进化变迁的法则，说明社会演变，人类活动行为的影响”<sup>④</sup>。他们普遍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史的分期问题，也反映了这一点。梁启超不愧是文化史研究的创始者，他看到了文化史自身的发展规律，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史的分期不应与政治史划一的重要思想。<sup>⑤</sup>从宏观上看，此期的研究者多以上古、中古、近世对中国文化史作长时段的区分；从微观上看，则是超越王朝界限，力图以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作中时段的区分。前者可以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为例，它以远古至两汉为上古；魏晋至宋、元为中古；明至当代为近世，并依此分为三编，构建全书体例。柳诒徵写道：

吾书凡分三编：第一编，自远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此三期者，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特就其蝉联蜕化之际，略分畛畔，以便寻绎。<sup>⑥</sup>

后者可以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为例，它分中国文化史为八期：

① 王治心：《中国文化史类编·绪论》，上海，作者书店，1943。

②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弁言”及“绪论”。

③ 何炳松：《何炳松论文集》，148页。

④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绪论》。

⑤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九，172页。

⑥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1页。

自太古至西周的宗法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宗法社会破裂后文化自由发展的时期；秦汉两代统一安定的向外发展的时期；魏晋朝民族移徙印度新文化输入的时期；隋唐两代民族同化成功新文化出现的时期；晚唐五代宋朝民族能力萎缩保守思想成熟的时期；元明清三朝与西方文化接触逐渐蜕化的时期；晚清以至今日大革新的时期。<sup>①</sup>

他们的上述分期是否科学，可不置论；重要在于，他们都力图从中外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大势上，考量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无疑都表现出了可贵的新思维。

(3) 唯物史观的运用。尽管此期的多数研究者并未接受唯物史观，但是毕竟有部分学者已开始尝试和倡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化史。例如，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说：“社会生产，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本小册子是着重于生产力去分析文化的进程。”<sup>②</sup> 陈安仁的《中国文化演进史观》也强调，一国的经济“与一国的文化进程，有密切的关系，重大的影响”。作者进而引德国学者的话说：“无论如何，唯物史论包含一个大真理，植物赖其所生地的肥料而生长，繁殖开发，同样道理，可知食物根源的扩张（如由农业），生产方法的进步（如因资本主义的制度），工艺上的文明（如铁路、省劳动的机器等等），对于文化发达发生的影响，远胜于道德教训、宣讲书籍、艺术品、哲学系统。”尽管经济并非影响文化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就一切社会学的现象看起来，经济唯是有大影响于文化发达的”。<sup>③</sup> 固然，这些研究者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与把握，尚属粗浅，故其于文化史现象的分析一时也难以避免简单化的倾向。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终究属于发轫期，粗犷有余而精密不足。20世纪30年代初，朱谦之著《文化哲学》一书，以为已有文化史研究的不足，在于普遍缺乏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陈寅恪也指出，“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失之在“滞”；新派多留学生，喜欢照搬外国理论，其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失之在“诬”。<sup>④</sup> 二者的批评有相通之处，颇能中其肯綮。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等具体的部门文化史的研究还在继续外，文化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实陷

① 常乃德：《中国文化小史》第1章，上海，中华书局，1928。

② 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144页，上海，文光书店，1948。

③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61页。

④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于中断。这主要是受“左”的思潮影响，视文化史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渊藪而加以简单否定的结果。

中国文化史研究枯木逢春，其根本转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国人得脱“左”的羁轡，百业发舒。与此相应，中国文化史研究与“文化热”同时升温，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更似春潮勃发，迅速蔚为大观：报刊上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展开长时间激烈的争论；文化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在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先后建立了起来；专门的学术团体、期刊出现了；国际国内的或地方的相关学术讨论会，每年都在举行；文化史不仅进入了高校的课堂，而且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研究方向。这场文化和文化史“热”，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仅见，以至于我们迄今都可以感受到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出版的著作为数十十分可观。冯天瑜等的《中华文化史》、阴法鲁等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刘蕙孙的《中国文化史稿》等，是有影响的通史性的著作；万绳楠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等，则是断代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此外，有关区域文化史、专题文化史、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著作，为数最多，更不乏精品佳构。此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无论从质量与数量上看，还是从涉及领域的广度与深度上看，均非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所能同日而语。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文化及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得以复苏乃至于勃兴，归根结底，是中国揭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和社会酝酿着转型的产物。所谓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社会目标，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自身整个文化的现代化。就中国而言，文化的现代化不应也不可能是全盘西化，它只能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此，去除糟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便成了中国现代化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也因是之故，欲解答现实中的文化问题，便不能不去请教历史。不仅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任重道远，它需要不断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认同感，中国文化史研究恰恰可以高扬爱国主义，为之提供无可替代的民族精神的支柱。很显然，20世纪末，国人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史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当然，思想既经解放，学术研究无禁区，文化史这块长期荒芜却又辽阔而肥沃的学术园地，自然会吸引来众多拓荒者。这即是说，中国文化史学科



自身发展的强劲内驱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要言之，此期中国文化史研究复苏的原因与20世纪20—30年代肇端的原因，一脉相承，只是因时代条件的差异而表现出愈加斑斓的特色罢了。

同时，也应当看到，此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虽然成就斐然，超过了前期，但它在更高的层面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前期业已提出的问题，而且面临着新的分歧。例如，柳诒徵等人早已提出，中国文化史应是综合的，不应是专门史的组合，这在今天虽成共识，但究竟应怎样实现综合，当年的柳诒徵等人在实践上并未解决，今天我们也仍然处于摸索的过程中。文化概念的界定依然莫衷一是，此不待言；但是，如今文化史的界定本身也成了争论的问题。此外，朱谦之曾提出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应当说，迄今足以表现中国气派的文化学理论，尚未见之。从西方引入的各种文化学理论为数虽多，但有经久生命力的学说也不多见。陈寅恪所说的失之于“滞”的旧派学者固然不存在了，但他对于失之于“诬”的新派学风的批评，却不能说已无现实的意义。

学术的本质在于发现问题，追求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的现象是正常的，它反映了学术研究无止境和学术研究的艰辛。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不应沉湎于概念的争论而停止了实践的探索。苏联的学者说得对：“如果只集中注意力去制定一个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它的研究对象的准确的、完善无缺的定义，再开始研究俄国文化史未必是合适的。”<sup>①</sup>唯其如此，我们以为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文化通史》，不仅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其本身即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 三、中国文化史发展脉络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因受其根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展开形式的制约，从而显现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sup>②</sup>因之，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对于正确认识事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来便重视人类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和“具有独特的特征的”所谓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

<sup>①</sup> 转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383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